

我国史籍中有关南海疆域的记载

李 金 明

内容提要 自宋元至明清,我国南海疆域的范围与界限已有了明确的划定。南宋时,越南北部的交趾洋与印尼的纳土纳群岛,被看作是与我国南海疆域西面和南面接境的两个地方。至元代,我国南海疆域的界限已基本确定:其西面与越南北部的交趾洋接境,西南面到达越南东南端的昆仑洋面,南面与印尼的纳土纳群岛相邻,东南面到达文莱与沙巴洋面。明清时,进一步把越南中部的外罗海,与从海南岛南面一直延伸到昆仑洋面的七洲洋,一起确定为中国海域与外国海域的天然界限,而位于七洲洋东面的南沙群岛海域亦普遍被认为是中外海洋的分界。我国的南海海域,在清初属海南岛管辖,广东水师官兵经常至西沙群岛海域巡视,代表当时的中国政府行使主权与管辖权。

关键词 南海疆域 交趾洋 七洲洋 南沙群岛 西沙群岛

我国的南海疆域,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其最南端到达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历来就是如此划定。在我国浩如瀚海的史籍中,自宋元以来就有有关我国南海疆域界限的记载。越南外交部在1982年1月18日发布的“白皮书”中,曾嘲笑我国最感困窘的是无法证明“从何时占有了西沙和南沙,以及如何对这两个群岛行使了主权”^①。为驳斥这种谬论,本文拟对我国史籍中有关南海疆域的记载进行考释、论述,确定我国历史上南海疆域的范围和界限,以证实西沙和南沙群岛自宋元以来已明确列入我国的南海疆域之内,我国已对这两个群岛行使了主权和管辖权。

一. 宋元时期有关我国南海疆域的记载

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桂林通判周去非在其撰写的《岭外代答》一书中写道:“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閩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之下”^②。这个记载表明:从苏门答腊东北部的三佛齐来到中国的船只,过了上下竺与交洋之后,即进入中国的海境。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南海疆域是和上下竺与交洋接境。

交洋,即交趾洋之简称,指的是今越南北部沿海一带。上下竺,亦称竺屿,它与《岛夷志略》中的东西竺同属一地。根据外国学者罗克希耳的考证,认为上下竺是位于马来半岛东南海上的奥尔岛(Pulau Aur)^③。其理由是,此岛马来名 Aur,义为竹,Pulau Aur 犹言竹

① 越南外交部白皮书:《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越南领土》,载戴可来、董力合编:《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页71。

②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外国门下·航海外夷。

③ 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冯承钧译本,页68。

屿,而“竹”与“竺”同义,故认为竺屿即奥尔岛^①。看来这只是从字面上进行考释,很难令人信服。我们有必要看看《岛夷志略》中有关东西竺的描述:“有酋长”,“田瘠不宜耕种,岁仰淡港(或作淡洋、淡净),米谷足食”,“番人取其椰心之嫩而白者,或素或染,织而为簟,以售唐人”^②。从这里可以了解,东西竺不仅有居民,有酋长,而且有自己的手工特产——椰心簟,中国商人到此进行收购。这些说明,东西竺起码是一个较大的部落居住区。反观奥尔岛却不然,它距离丁吉岛(Pulau Tinggi)东北约23海里,位于一系列岛屿的东南端,在南中国海主航道的西侧。岛上有茂密的树林,表面陡削,有两个山峰,南边一个较高,约1792英尺(546.2米),呈园盖形;北边一个高1434英尺(437.1米)^③。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岛,仅作为“往来船舶之陆标与淡水之取给地”^④。它与《岛夷志略》中描述的东西竺显然不相符,故把东西竺考证在奥尔岛看来是行不通的。

那么,东西竺究竟在何处呢?依我之见,它可能与《元史·史弼传》记载的“东西董”同属一地。东西竺殆为东西董的讹称,因竺与董在厦门话的发音有所相似(竺读 tiok,董读 tong),容易搞混。按照格仑威尔的考证,东董为纳土纳群岛(Natuna Is.),西董指亚南巴群岛(Anamba Is.)^⑤。但是,《岛夷志略》又写道:东西竺“石山嵯峨,形势对峙。地势虽有东西之殊,不啻蓬莱、方丈之争奇也”。看来东西竺两地的距离应该是靠得比较近,有对峙之势。而纳土纳群岛与亚南巴群岛的距离却有120余英里之遥,故我认为,东西竺似都在纳土纳群岛中,东竺为北纳土纳群岛,西竺为南纳土纳群岛。而每年供应东西竺米谷的淡港(即婆罗洲西北岸的古晋),就与纳土纳群岛相邻近,这符合《岛夷志略》的描述。我们再来看看出产椰心簟的地方,据《诸蕃志》写道:“椰心簟出丹戎武啰,番商运至三佛齐、凌牙门及阁婆贸易”^⑥。丹戎武啰的对音是 Tanjongpura,即爪哇语淳泥岛之称,指的是婆罗洲的西南岸,亦与纳土纳群岛相近。另外,《岛夷志略》还写道:东西竺与占城、昆仑“鼎峙而相望”^⑦。当时的占城,指的是今越南东南部的藩朗(Phan Rang)或藩切(Phan Thiet),昆仑是越南东南端海面的昆仑岛,它们与纳土纳群岛的东西竺正成“鼎峙而相望”,与《岛夷志略》的记载相吻合。

确定了东西竺(上下竺)的地理位置后,我们可回过头来解释一下上面引述的《岭外代答》的记载:“从苏门答腊巨港(三佛齐)到中国的船只,沿正北方向航行,经过纳土纳群岛和越南北部的交趾洋后,则进入中国的海境。如打算到广州者,可从香港附近的屯门入口;如打算到泉州者,可从陆丰附近的甲子门入口。而从爪哇(阁婆)来的船只,偏西北方向航行,过了加里曼丹(十二子石)后,则与巨港来的船只汇合于纳土纳群岛之下。这个记载把当时我国南海疆域的界限讲得很清楚,即西面与越南北部的交趾洋接境;南面与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群岛相邻,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只要驶过纳土纳群岛和交趾洋,就进

① 苏继颖:《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229。

② 汪大渊:《岛夷志略》,东西竺。

③ China sea Pilot, First Edition, London, 1937, Vol. I, P. 61.

④ 《岛夷志略校释》,页229。

⑤ 见张礼千:《东西洋考中之针路》(新加坡南洋书局,1947年版),页25。

⑥ 赵汝适:《诸蕃志》,卷下,椰心簟。

⑦ 《岛夷志略》,昆仑。

入了中国海境。由此可见,早在南宋时期,我们南海的西面与南面海界已有了明确的划分。

这一点亦可从南宋时期的另一本书——《诸蕃志》中得到证实。这本书是当时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的赵汝适于宝庆元年(1225年)撰写,他在序言中写道:“汝适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牀、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①。赵汝适是市舶提举,经常要与外国商人打交道,为了了解外国情况,他必须利用休闲时间阅读《诸蕃图》(外国地图),于是发现了被称为航海危险区的石牀(塘)、长沙(指我国的南海诸岛),和作为中国与外国海洋界限的交趾洋与纳土纳群岛(竺屿)。由此可以了解,南宋时有关我国南海疆域的记载已较普遍,不仅书中有描述,而且当时的外国地图《诸蕃图》亦有标明,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比周去非、赵汝适早一二百年的南印度注辇国使臣娑里三文,于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来到中国,就是循着上述三佛齐到中国的航线。《宋史·注辇传》这样写道:“……至三佛齐国,又行十八昼夜,度蛮山水口,历天竺山,至宾头狼山,望东西王母塚,距舟所将百里”。这里提到的“天竺山”,即上述的竺屿、上下竺或东西竺,也就是纳土纳群岛;“宾头狼”是今越南金兰湾附近的藩朗。可见娑里三文的船只航经纳土纳群岛至藩朗。向东望去,可看到离船近百里之外的“西王母塚”,它可能就是我国南海疆域内的南沙群岛。

到了元代,江西南昌人汪大渊曾两次“附舶东西洋”,至正九年(1349年)以亲身经历写下《岛夷志略》一书。书中把我国南海诸岛称为“万里石塘”,他根据未烹“海外之地与中原地脉相连”的学说,写道:“石塘之骨,由潮州而生,迤邐如长蛇,横亘海中,越海诸国,俗云万里石塘。……其地脉历历可考,一脉至爪哇,一脉至勃泥及古里地闷,一脉至西洋遐昆仑之地”^②。汪大渊在这里标明了南海诸岛的范围,一面到印尼的爪哇,一面到文莱(勃泥)和古里地闷,一面到西洋遐昆仑。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古里地闷与西洋遐昆仑究竟在何地?

古里地闷,亦称吉里地闷,纪里尼(Gerini)将其考定在小巽他群岛东端的帝汶岛。其理由是,吉里地闷的对音是 Gili Timor, Gili 是岛的意思^③。但是,按照《岛夷志略》的描述,古里地闷似乎与勃泥同处一地,是邻近的两个地方,而帝汶岛与文莱的距离相当遥远,且不在同一方向,显然与所述不符。我们从陈伦炯《海国闻见录》的“四海总图”中可以看到,在加里曼丹岛东北,与文莱相邻的是吉里闷,它可能是吉里地闷的讹称。据《海国闻见录》记载:吉里闷东邻苏禄,西接文莱,从“吕宋至吉里闷三十九更,至文莱四十二更”^④。可见其位置相当于今马来西亚的沙巴,它既与文莱同处一地,又是相邻的两个地方,与《岛夷志略》的描述相符。

至于西洋遐昆仑,按当时对东西洋的划分,是以文莱为界,文莱以东称为东洋,文莱以西称为西洋^⑤。故遐昆仑冠以“西洋”二字,指的应是文莱以西的地方,而“遐”字苏继顾先

① 《诸蕃志》,序言。

② 《岛夷志略》,万里石塘。

③ 《郑和下西洋考》,页73。

④ 陈伦炯:《海国闻见录》,上卷,东南洋记。

⑤ 见张燮:《东西洋考》,卷5,东洋列国考·文莱。

生将之作“远”字解,认为遐昆仑“指印度洋西南部之岛屿,即今马达加斯加岛。此岛阿拉伯语作 jazirat al Qumr,其末一字,与昆仑二字为近音”^①。这显然太过遥远,相差十万八千里,难以置信。我的看法是,“遐”字殆是“假”字之误,因这里的昆仑明显不是我国西北的昆仑山,故称之为“假”,这一点《海国闻见录》曾明确地指出:“昆仑者,非黄河所逸之昆仑也。七洲洋之南,大小二山,屹立澎湃,呼为大昆仑、小昆仑,山光甚异”^②。另者,昆仑一名不是真名,而是从马来语 Condon 一词音译过来,意为“冬瓜岛”。黄衷在《海语》一书中,曾描述昆仑岛“冬瓜延蔓,苍藤径寸,实长三四尺,大踰一围,糜腐若泥淖”^③。可见昆仑岛系因盛产冬瓜而得名,是由马来语音译而来,并不是真正称为昆仑,故《岛夷志略》称之为“假昆仑”,包括有这两方面的含意,指的是今越南东南端海域的昆仑岛。而我国传说中经常把昆仑与西王母相提并论,故前面提到的注辇国使臣娑里三文才会把我国南沙群岛称为“西王母塚”,以同“假昆仑”相呼应。

通过上述考释,我们可了解《岛夷志略》中记载的我国南海诸岛的范围,它起自广东潮州,曲折连绵向海中延伸,一面到爪哇,一面到文莱和沙巴,一面到越南东南端海域的昆仑岛。由此说明,早在宋元时期,我国南海疆域的范围与界限已基本确定下来:其西面与越南北部的交趾洋接境,西南面到达越南东南端的昆仑洋面,南面与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群岛相邻,东南面到达文莱与沙巴洋面。这个范围相当宽广,故汪大渊感慨地说:“以余推之,岂止万里而已哉”。

二. 明清时期有关我国南海疆域的记载

明清时期,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及航海者对我国海域认识的加深,有关我国海域与外国海域分界的记载则更趋具体。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黄衷撰写的《海语》一书,把中外海域的分界称为“分水”。他写道:“分水在占城之外罗海中,沙屿隐隐如门限,延亘横亘不知其几百里,巨浪拍天,异于常海。由马鞍山抵旧港,东注为诸番之路,西注为朱崖、儋耳之路,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④。外罗位于越南中部海面,因在广南占毕罗(占婆岛)外洋而得名,法国学者伯希和将其考定在理山群岛(Culao Ray),又名广东群岛(Pulou Canton)^⑤。外罗在当时航海者的心目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外罗山被作为航海标志,过往船只均以之为“准绳”。《海国闻见录》写道:“独于七洲大洋,大洲头而外,浩浩荡荡,罔有山形标识……而见广南占毕罗外洋之外罗山,方有准绳,偏东则犯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则恐溜入广南湾”^⑥。可见船只航过海南岛东部的大洲岛后,茫茫没有较高的陆地作为标识,唯有见到外罗山才说明航向正确,如偏东一点则触到中国境内的万里长沙、千里石塘,偏西一点则溜入越南的广南湾。这说明航行

① 《岛夷志略校释》,页320。

② 《海国闻见录》,上卷,昆仑。

③ 黄衷:《海语》,卷3,畏途·昆仑山。

④ 《海语》,卷3,畏途·分水。

⑤ 《东西洋考中之针路》,页14。

⑥ 《海国闻见录》,上卷,南洋记。

中应密切注意外罗山,丝毫不能忽视,否则真可谓“差毫厘,失千里也”。

另方面,外罗海是中外两条航线的汇合点。从中国到外国的船只,一般是乘东北风,走外罗海东边的航线,“分水”称之为“东注”;而从外国返海南岛的船只,则乘西南风,航经外罗海西边的航线,“分水”称之为“西注”。如万历六年(1578年)暹罗馆的翻译握文源叙述从中国到暹罗的航程说:“由广东香山县登舟,用北风下,指南针正午,出大海,名七洲洋,十昼夜可抵安南海次,中有一山名外罗,八昼夜可抵占城海次……此皆以顺风计,约四十日可至其国(指暹罗)”^①。另据海南岛渔民说,他们“从新加坡回海南岛要经过越南沿海岛屿,过昆仑岛后……再往北到外罗山,外罗是个山岛,岛上有山,那里一带水流很急”^②。

外罗海在中外航海中的重要地位,使之成为中国海与外国海的天然分界,因此《海语》称之为“天地设险以域华夷者也”。由此说明,在明代时,越南中部的外罗海已成为中国海域与越南海域的分界,也就是我国南海疆域西面的界限。

有关外罗海东西两条航线的记载,在清代史籍中显得更加详细。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之间,随番舶出洋,在海上漂泊14年之久的谢清高,在其口述的《海录》一书中写道:“噶喇叭,在南海中为荷兰所辖地,海舶由广东往者,走内沟,则出万山后向西南行,经琼州、安南至昆仑,又南行经三、四日到地盆山,万里长沙在其东。走外沟,则出万山后向南行少西,约四、五日过红毛浅,有沙坦在水中,约宽百余里,其极浅处止深四丈五尺,过浅又行三、四日到草鞋石,又四、五日到地盆山,与内沟道合,万里长沙在其西。沟之内、外,以沙分也”^③。这里说的“内沟”、“外沟”,与上述《海语》的“西注”、“东注”一样,指的都是经过外罗海东西的两条航线。地盆山,亦称地盘山,即马来半岛东南海面的潮满岛(Pulou Tioman);红毛浅,殆指中沙群岛,因其尚未完全露出水面,水显得较浅,而红毛船(指荷兰、英国等西欧的夹板船)船底较深,至此需注意防浅,故名为“红毛浅”^④;草鞋石即萨帕图岛(Pulou Sapatu),位于北纬9°59′、东经109°05′,为葛威克群岛(Catwick Is.)最东边的一岛,因从某些方向看象只鞋而得名^⑤。

按照《海录》的描述,从广东到印尼雅加达有两条航线:一条称“内沟航线”,船驶出万山群岛后,则向西南航行,经过海南岛、越南中部沿海,至昆仑岛,又向南航行三四天到潮满岛,当船航经越南中部沿海时,万里长沙(西沙群岛)就在船的东面。另一条称“外沟航线”,船驶出万山群岛后,则向南偏西航行,大约四五天经过中沙群岛,又航行三四天到萨帕图岛,再航行四五天到潮满岛,在这里与“内沟航线”汇合,当船航经中沙群岛时,万里长沙(西沙群岛)就在船的西面。所谓的内、外沟航线,就是从西沙群岛处分开。上面提到的“外沟航线”,基本与今天新加坡——广州的航线相符,可见当时的记载还是比较准确的。

① 章潢:《古今图书编》,卷59,古南海夷考略·暹罗国。

② 《渔民蒙全洲的口述材料》,载韩振华主编:《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页408。

③ 谢清高:《海录》,卷中,噶喇叭。

④ 见郑光祖:《舟车所至》辑本中的《海录》。

⑤ China Sea Pilot, Vol. I, P. 106.

《海国闻见录》也谈到这条“外沟航线”，它写道：“中国往南洋者，以万里长沙之外，渺茫无所取准，皆从沙内粤洋而至七洲洋，此亦山川地脉联续之气，而于汪洋之中以限海国也”^①。《海国闻见录》的“四海总图”与《海录》，卷首的“亚洲总图”一样，都是把七洲洋标于琼州与昆仑之间，长沙、石塘皆在其东，长沙包括了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故把经过中沙群岛的“外沟航线”称为“从沙内粤洋而至七洲洋”。而这个七洲洋的范围极广，北起海南岛南面的西沙群岛洋面，南至越南东南的昆仑岛洋面，连绵不断，成为汪洋大海之中我国海域与外国海域的天然界限。

清代后期的史籍，一般把南沙群岛洋面作为中国海域与外国海域的分界。颜斯综的《南洋蠡测》写道：“南洋之间有万里石塘，俗名万里长沙，向无人居。塘之南为外大洋，塘之东为闽洋。夷船由外大洋向东，望见台湾山，转向北，入粤洋，历老万山，由澳门入虎门，皆以此塘分华夷中外之界。唐船单薄，舵工不谙天文，唯赁吊舵验海底泥色，定为何地，故不能走外大洋。塘之北为七洲洋，夷人知七洲多暗石，虽小船亦不乐走。塘之西为白石口……”^②。俗名万里长沙的万里石塘，显然是指南沙群岛，因其四至标得很清楚：南面是中国境外的大洋，东面是闽省洋面，北面是西沙群岛洋面，西面是新加坡海峡的白石口。凡从中国境外大洋来的外国船只，向东航行，看到台湾岛后则转向北，进入广东洋面，经过万山群岛，由澳门入口虎门，他们都是把万里石塘（南沙群岛）作为中国海与外国海的界限。

这一点在姚文枬的《江防海防策》中亦有同样记载，它写道：“过琼州七洲洋，有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为南、北洋界限”^③。这里说的“南洋”，不是清末用来指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地区的南洋，而是指我国南海疆域外的海洋，以后南洋一名就以此引伸为对东南亚各国的统称；“北洋”也不是清末用来指奉天（辽宁）、直隶（河北）、山东沿海地区的北洋，而是泛指中国境内的海洋，因东南亚一带都把中国称为“北国”，把中国人称为“北人”，如宋代朱或的《萍州可谈》就写道：“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还者，谓之住唐”^④。于是，中国的物品亦被称为“北物”，如《安南小志》称：“国中又多药草，但国人不知制之，皆一致于中国，中国制而复送于安南，土人谓之‘北药’”^⑤。由此引伸下去，把中国境内的海洋称为“北洋”也就不难理解了。可见当时把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海域作为中国海与外国海的界限，已普遍被载入史册。

到了19世纪后期，在一些中国官员的游记中，则更明确地指出，西沙群岛就在我国南海疆域之内。例如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写道：光绪二年（1876年）十月，自香港出发，“二十四日午正，行八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十七度三十分，计当在琼南二、三百里，船人名之‘齐纳细’，犹言中国海也。海多飞鱼，约长数尺，跃而上腾至丈许乃下，左近‘柏拉苏岛’（即西沙群岛英文名Pracel的音译），出海参，亦产珊瑚，而不甚佳，中国属岛也”^⑥。张德夷的

① 《海国闻见录》，上卷，南澳气。

② 颜斯综：《南洋蠡测》，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篇，第10帙。

③ 姚文枬：《江防海防策》，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9帙。

④ 朱或：《萍州可谈》，卷2。

⑤ 姚文枬：《安南小志》，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0帙。

⑥ 郭嵩焘：《使西纪程》，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帙。

《随使日记》亦有同样记述：“二十四日，辛亥，晴，水平风顺，午正，行八百三十一里，在赤道十七度三十分，左近巴拉赛(Pracel)小岛，中国属岛也”^①。

以上引述的史籍记载说明，在明清时期，作为中外两条航线汇合点的外罗海，以及从海南岛南面的西沙群岛洋面，连绵不断地延续到越南东南端昆仑岛洋面的七洲洋，已成为我国南海疆域西面的天然界限，在汪洋大海中把我国海域与外国海域截然分开。而南沙群岛海域亦普遍被作为中国海与外国海的界限，即我国南海疆域的南面界限。

三．清政府在南海疆域内行使主权和管辖权

我国南海疆域内的洋面，在清代是属海南岛崖州协水师营管辖，据《崖州志》记载：“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西接儋州营洋界，东接海口营洋界”^②。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崖州水师营的巡洋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海南岛东部的万州东澳港，绕海南岛沿海，到西部的昌化四更沙为止，历程一千里；另一条是直接向南巡洋到越南中部的占城洋面，也就是到达我国南海疆域的西部洋面。

在康熙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1710~1712)任广东水师副将的福建同安人吴陞，就亲自巡洋至与昆仑岛洋面相接的七洲洋。《同安县志》写道：“吴陞，字源泽，同安人，本姓黄……擢广东副将，调琼州，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四更沙，周遭三千里，躬自巡视，地方宁谧”^③，我国外交部1980年1月30日文件指出：“这里所称七洲洋即今西沙群岛一带海域，当时由广东省海军负责巡逻”^④。但是，越南外交部却认为：“琼崖、铜鼓、四更沙均为海南岛沿岸的地名，而七洲洋则是位于海南岛东北海岸和位于海南东北处七个小岛之间的海区。可见，这只是在海南岛周围巡海，北京的结论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与地理实际”^⑤。其实，我国史籍记载的七洲洋有两个：一个是海南岛东北海面的七洲洋，另一个是西沙群岛海域的七洲洋。要分别那一个七洲洋，主要是根据记载的航线经过的地名顺序来定，如《海录》写道：“纪海国自万山始，既出口，西南行过七洲洋，有七洲浮海面故名，又行经陵水，见大花、二花、大洲各山……”这条航线经过的七洲洋在大洲、陵水之前，显然指的是陵水以北七洲列岛附近海面的七洲洋。而吴陞巡海的航线却是“自琼崖，历铜鼓，经七洲洋”，这个七洲洋在铜鼓之后经过，显然不是铜鼓前面的七洲洋，而是另一个七洲洋。那么，这个七洲洋在那里呢？我们可看看同时代的《海国闻见录》中的“四海总图”，七洲洋的位置是写在琼州与昆仑之间，长沙和石塘之西，可见包括了西沙群岛一带海域。19世纪70年代的郭嵩焘《使西纪程》，对七洲洋的位置描述得更加具体：“……在赤道北一十三度，过瓦蕾拉山，安南东南境也，海名七洲洋”。在北纬13°，越南东南华列拉岬的洋面，已

① 张德夷：《随使日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1帙。

② 钟元棣：《崖州志》，卷12，海防志一。

③ 吴堂：《同安县志》，卷21，武功。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文件：《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无可争辩》，载《人民日报》1980年1月31日。

⑤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部：《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与国际法》，载《汇编》，页193~194。

是延伸到西沙群岛以南的洋面,这个七洲洋的范围与《海国闻见录》描述的七洲洋一样。

另外,我们可看看吴陞巡海的航程。如果象越南外交部说的那样,“只是在海南岛周围巡海”,那么,即使从琼州府沿附近出发顺时针方向,自北而南,自东而西,又自南而北,自西而东,绕岛一周,其航程也不可能有3千里之遥。就以现代地图标出的航程来说,从海口市到三亚市是389公里,从三亚市到八所港是213公里,从八所港到海口市是261公里,共计863公里,合1726里^①。而余下的1274里则可能是巡视西沙群岛洋面往返的航程,就以三亚市到西沙群岛永兴岛的航程计算,单程330公里,往返660公里,合1320里,与记载的吴陞巡海的里程基本相符。可见当时吴陞巡视的七洲洋就是今天的西沙群岛海域,中国外交部文件的说法没有错。而越南外交部不负责任的指责,或者是缺乏中国历史地理的知识,或者是蓄意歪曲。

吴陞巡海的事实说明,西沙群岛海域在清初是由广东省水师负责巡视,清政府当时已在西沙群岛一带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这一点亦可从越南人黎贵惇的《抚边杂录》中得到证实。黎贵惇这本书被越南史学界誉为“最为完备和准确的史料,当时国内外尚无任何一个学者能象黎贵惇那样记述详备”^②。正是这本《抚边杂录》如此写道:“黄沙渚正近海南廉州府,船人时遇北国(中国)渔舟,洋中相问,常见琼州文昌县正堂官。查顺化公文内称:乾隆十八年(1735年),安南广义府彰义县割镰队安平社军人十名,于七月往万里长沙采拾各物,八名登岸,寻觅各物,只存两名守船。狂风断捉,漂入青澜港,伊官查实,押送回籍。”西贡白皮书当初引述这段文字的目的是想证实:“中国文昌县官员对于越南人前往万里长沙是入侵中国领水这一点并不介意”^③。然而,适得其反,这段文字反而证实了两点:一点是越南船只时常在洋中遇到中国渔船,相互问候,且经常看到琼州文昌县正堂官在洋中巡视。这说明我国渔舟一直是在西沙群岛海域进行生产,而这个海域属海南岛文昌县管辖,文昌县的官员经常在洋中巡视,这一点与上述吴陞巡海到西沙群岛海域的事实相互佐证。另一点是安南安平社军人往万里长沙采拾沉船遗物时,遭风漂到青澜港,清朝官员获悉后,经过审讯核实,即将他们“押送回籍”,驱逐出境,充分显示了清政府在我国南海海域内行使了主权和管辖权。

宣统元年(1909年)四月,两广总督张人骏在处理完日本商人西泽吉次非法侵占我国东沙群岛的事件后,考虑到我国南海疆域内的其他岛屿,如西沙群岛等,若不及早注意保护,难免又会发生类似东沙群岛被侵占的纠纷。于是,他特派副将吴敬荣前往西沙群岛进行巡视。吴接受命令后,即率170人,分乘伏波、琛航、广金三艘军舰,以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为总指挥,前往西沙群岛巡视。他们先后到达了伏波、甘泉等14岛,每到一岛则勒石命名,在珊瑚石上刻字曰:“大清光绪三十三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巡阅至此”,并命木匠以木架建木屋于岛上,以椰席为壁,地皆铺椰席,竖高5丈余之白色桅杆于屋侧,挂黄龙国旗,重申中国的主权^④。

① 见《中国地图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3年版),页23。

② [越]阮国胜:《黄沙、长沙》,载《汇编》,页269。

③ 西贡外交部:《关于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的白皮书》,载《汇编》,页9~10。

④ 见《李准巡海记》,载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0日。

对于李准此行,越南外交部曾说是“进行闪电式的登陆之后又火速退出,这是侵犯越南主权的行爲,绝对不能看作是中国行使主权的行爲”^①。事实上,李准一行自四月初二日启行,到四月二十六日返省,前后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所到西沙各岛,皆把从大陆带去的牲畜山羊、水牛雌雄各数头放于岛上,并令海军测绘生绘制地图,呈送当时的海陆军部及军机处存案;归来后,又根据其巡视经过,草拟了开办西沙群岛的八项计划^②。这些说明,此次巡海是按计划进行的,既非“闪电式的登陆”,又非“火速退出”,完全是在自己疆域内行使主权的一种表现。越南外交部谎称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这只是一种莫明其妙的假想,本文上述列举的史实就是对这种假想的最好反驳。李准一行重申我国在西沙群岛的主权,在国际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英国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海指南》就写道:“西沙群岛有两个主要岛群,即宣德群岛(the Amphitrite group)和永乐群岛(the Crescent group),还有一些小岛及暗礁。1909年中国政府将其列入版图,并经常有船队前往巡视”^③。

综上所述,自宋元至明清,我国南海疆域的范围与界限已有了明确的划定。首先,越南北部的交趾洋与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群岛,被看作是与我国南海疆域西面和南面接境的两个地方,凡来华贸易的外国船只,只要驶过纳土纳群岛和交趾洋,则认为是进入中国之境。其次,我国南海诸岛的范围相当广阔,它起自广东潮州,曲折连绵,向海中延伸,一面至爪哇,一面至文莱和沙巴,一面至越南东南端的昆仑岛。这里基本确定了我国南海疆域的界限:其西面与越南北部的交趾洋接境,西南面到达越南东南端的昆仑洋面,南面与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群岛相邻,东南面到达文莱与沙巴洋面。第三,越南中部的外罗海,是中外两条东西航线的汇合点,它与从海南岛南面一直延伸到昆仑洋面的七洲洋,一起成为中国海域与外国海域的天然界限,而位于七洲洋东面的南沙群岛海域亦普遍被认为是中外海洋的分界。我国的南海海域,在清初是属海南岛管辖,广东水师官兵经常至西沙群岛海域进行巡视,代表清朝政府行使主权与管辖权。1907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一行又到西沙各岛进行巡视,重申我国在西沙群岛的主权,得到国际上的承认。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

① 越南外交部:《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与国际法》,载《汇编》,页108。

② 见《李准巡海记》。

③ China Sea Pilot, Vol. I, P. 107.